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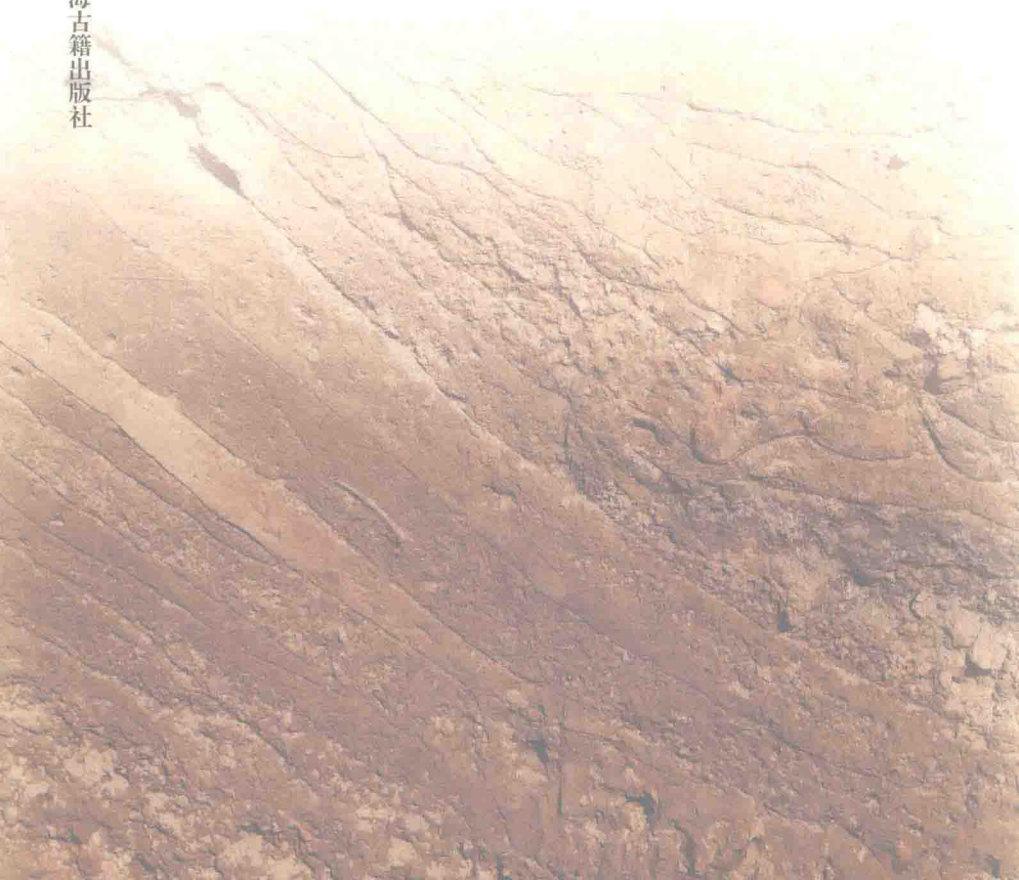
震旦博雅书系之三

追跡三代



孙庆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震旦博雅书系之三

追踪三代



孙庆伟 著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迹三代 / 孙庆伟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6

(震旦博雅书系)

ISBN 978-7-5325-8101-6

I. ①追… II. ①孙… III. ①夏文化(考古)—研究
②商周考古—研究 IV. ①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3397号

震旦博雅书系之三

追迹三代

孙庆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36.75 插页 3 字数 495,000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8101-6

K·2208 定价: 9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
(项目批准号14JJD780004)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夏商周考古学史的书。

夏商周考古与中国考古学共同起步,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个世纪以来,夏商周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重建中国古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学术界依然分歧重重,远未达成共识。因此,正确认识夏商周考古已有的成就,深入了解当前面临的问题,明确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

围绕重大学术问题,对夏商周考古学史的若干方面进行梳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这里的十篇文章所涉及的是夏商周考古最核心,同时也是争论最多的几个问题。从内容上讲,可以分为四组。

第一组包括前三篇,是比较纯粹的学术史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是与“古史辨”运动密切相关的。顾颉刚是“古史辨”运动的主将,而他的疑古思想又是从怀疑大禹是否为人王开始的。本书第壹篇《个性、时势和境遇——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是以顾先生《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为线索,结合最新出版的《顾颉刚全集》中的有关内容,全面分析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从而为正确理解他的史学主张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第贰篇《问禹为何物——顾颉刚的夏史研究》着眼于顾颉刚的夏代史研究,企图厘清顾先生一生在此问题上的前后变化,由此来辨明“古史辨派”学者对夏代史究竟持何种意见。分析表明,虽然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初期曾经相信“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观点,转而关注禹是否具有神性以及他是如何与

尧、舜发生联系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讲授“中国上古史”课程,为编写授课讲义,他才真正开始系统研究夏代史,并与童书业合作撰写了《夏史考》。与此同时,为配合上古史研究,顾先生又新开“古代地理研究”课程,从而不可避免地涉及《禹贡》等地理著作,并必须对“九州”和“四岳”等问题作出回答,从而激发他从崭新的角度来研究夏代史。终顾颉刚一生而言,他是“疑禹”而不“疑夏”,即始终怀疑大禹是否为真实的人王,但从未怀疑夏代的存在为真正的史实。所以,顾先生积极倡导建设真实的夏代史,并认为其唯一的途径在于考古学,且始终关注考古学在此领域的新进展。

第叁篇《有心还是无意——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企图纠正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认为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活动——1926年李济在汾河流域的调查以及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为了探索夏文化。该文通过细审李济当年的调查和发掘报告,详细梳理他与袁复礼的调查行程,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与学术背景,力图证明李济的晋南之行绝非为了夏文化,他的目的只能是为了探索“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并以科学发掘所得的考古材料来回应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第二组包括第肆、伍、陆、柒四篇文章,均是围绕夏与早商文化展开的讨论。

寻找夏文化是夏商周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肇始是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调查,此后数十年间学者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大体而言,以1977年登封告成遗址现场会为标志,夏文化探索历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告成会议之前,学术界普遍信奉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告成会议上,邹衡石破天惊般地提出了郑亳说,不仅打破了西亳说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夏文化探索的新时代。《考古学的春天——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学术史解读》一文着重分析了告成会议之前的夏文化探索历程,特别是从学术背景上分析了安金槐、赵芝荃、邹衡以及

夏鼐四位关键学者各自的学术主张及其必然性,是对1977年之前的夏文化探索工作的一次总检讨。

自邹衡在告成会议上提出了郑亳说之后,夏文化的论争才真正开始。特别是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之后,在二里头遗址西亳说(旧西亳说)、郑亳说之外又有了偃师商城西亳说(新西亳说),论争进入到白热化状态。本书第五篇《交锋——邹衡的夏商文化论争》就是以邹衡的学术主张为主线,将告成会议之后各家观点串联起来,通过对论争过程及论争焦点的分析,讲述了郑亳说与新、旧西亳说的主要学术主张,分析了各派代表性学者观点转变的理由及其动机,从而客观地看待各家观点的优势与劣势,并希望由此作为继续推进夏商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

夏文化、先商文化与早商文化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要从考古学上确定夏文化,其基础就是要首先辨析出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本书第六篇《商从哪里来——先商文化探索历程》即以先商文化为对象,完整地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对商文化年代序列的构建过程,着重分析张光直与邹衡两位学者在商民族起源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原因;同时通过对比豫东鲁西南与豫北冀南两地区的考古新成果,指明商人源自东方这一传统说法不容忽视。而目前学术界在漳河型文化、南关外期遗存以及岳石文化等考古学文化族属上的纷争,表明探索先商文化不仅需要新材料,更亟需理论指导。

如果把夏商文化研究聚焦于一点的话,那必然是夏商分界问题。解决了夏商分界,自然就分辨出夏文化、早商文化、先商文化乃至其他一些同时期的族属文化。因此,夏商分界问题堪称夏商周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本书第七篇《什么可以成为夏商分界的证据——夏商分界研究综述》的出发点不是要解决这个具体问题,而是全面回顾与总结数十年来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得失。分析表明,虽然目前郑亳说与新西亳说在观点上已经十分接近,但这种趋近的背后其实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一方面,两派学者在偃师商城是否为亳都这一关键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另一方面,他

们却“各取所需”地将最早的商文化确定在二里头四期后半段或四期之末,从而将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说迅速地置于几乎无人问津的境地。但正如郑亳说与旧西亳说学者所指出的,新西亳说在证据上既不充分,在论证方法上也存在瑕疵。因此,在新西亳说学者更充分地论证偃师商城是成汤灭夏之后在夏王朝腹地所新建的亳都之前,旧西亳说、郑亳说乃至夏商都邑“有条件的不可知论”等观点依然有存在的理由,都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换句话说,新西亳说与郑亳说目前达成的“共识”并不能视为夏商分界问题的有效解决,现有的夏商文化体系还需进一步验证。

第三组仅《著史与分期——李济与邹衡的殷墟文化研究比较》一篇文章。

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以殷墟为中心构建的殷商信史则是中国考古学在 20 世纪取得的最瞩目成就。毋庸置疑,李济和邹衡堪称是殷商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分别奠定了 1949 年前后殷墟考古的总基调。但李济与邹衡二人治学取向与研究目标迥然有别,具体到殷墟,可以一言以蔽之:李为著史,邹为分期。1928 年,当李济第一次赶赴殷墟,就是为了寻找新史料,建设“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而来。1949 年之后,李济虽身处台湾,但依然致力于建筑可靠的殷商新史,这一宗旨也直接影响到他对殷墟考古材料的整理方法,他的系列论著也都围绕著史而展开。反观邹衡,自接触殷商考古材料伊始,他就专注于商文化年代序列的构建。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确定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存的年代,邹衡第一次对殷墟陶器进行分期;60 年代,以殷墟陶器分期为基础,邹衡进而综合殷墟铜器、墓葬、卜辞和建筑遗存,完成了对殷墟文化的完整分期。邹衡的分期成果为重写殷商新史搭建了可靠的年代框架,但他自己却未在此问题上更进一步。事实是,殷墟分期不仅确立了新中国考古学文化分期的新范式,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分期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与古史重建的初衷渐行渐远。如何处理著史与分期的关系,是中国考古学界需要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四组包括第玖和第拾两篇文章,着眼点都是先周文化。

《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先周文化探索的早期阶段》一文以徐旭生、苏秉琦和石璋如三位学者为中心,回顾了1949年以前学术界在先周文化探索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徐旭生开陕西考古的风气之先,虽然囿于客观条件,参与的具体工作有限,但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苏秉琦作为新生力量,初次参加考古工作,即受命整理宝鸡斗鸡台发掘材料,他不预设任何前提,却通过对瓦鬲的研究,找到了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线索。而石璋如秉持殷墟发掘的良好训练,带着明确学术目的前往关中调查,致力于构建殷墟之外的另一个考古学标尺,最终却舍瓦鬲而以彩陶为周人的文化遗存,其结果也着实令人唏嘘。分析苏、石二位学者当年的思路与工作过程,可以看出考古学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至今仍具启发意义,值得考古学同行借鉴与深思。

《联裆鬲还是袋足鬲——先周文化探索的困境》一文则概述了1949年之后的先周文化探索成果,特别是分析了以邹衡、徐锡台、胡谦盈、张长寿、尹盛平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及以刘军社、张天恩、雷兴山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贡献得失、学术观点的异同及其原因。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就考古学层面而言,目前学术界对先周文化的研究可谓臻于极致,再加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材料的佐证,先周文化探索应该说已经具备了种种有利条件。但结果依然差强人意,学者们仍然纠结于联裆鬲和袋足鬲与姬周、姜戎民族的对应关系,对周原、周公庙等大型都邑遗址的性质也未敢遽定。学术史研究表明,先周文化探索所面临的困境,与其说是材料的,毋宁说是理论与方法的。先周文化探索有可能成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研究的典范,为中国考古学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理论突破。

以上就是本书的大致内容。应该说,夏商周考古最核心的三个问题,即夏、商、周三族的来源与发展问题都已经涉及。作者深知自己学力有限,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史既缺乏足够的宏观把握,对学者们的具体学术观点也可能存在“误读”,因此书中的舛误一定不少,恳请

读者多加批评指正。另外，部分章节的初稿曾经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收入本书时在文字甚至观点上都作了修改，请读者在参考时以本书为准。

最后对本书的书名略作一点解释。《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追迹三代史事靠的是文献，考古学则主要依据实物资料来复原历史，二者殊途而同归。一部夏商周考古学史其实就是考古学者追寻三代史迹的历史，故以“追迹三代”名之。

目 录

前言.....1

壹 个性、时势和境遇——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1

一、个性.....4

二、时势.....9

三、境遇.....14

四、余论

——“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34

贰 问禹为何物——顾颉刚的夏史研究.....41

一、序言

——徐旭生与顾颉刚的“君子交绝，不出恶声”.....43

二、“古史辨”运动初期顾颉刚对夏代史的认识.....48

三、从两部上古史讲义到《秦汉的方士与儒生》.....53

四、《夏史三论》与《鲧禹的传说》.....60

五、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夏代史考证.....65

六、考古学：建设真实夏代史的唯一途径.....72

叁 有心还是无意——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77

一、相关诸说.....79

二、过程复原.....82

- 三、夏文化探索的“史语所传统”..... 94
- 肆 考古学的春天——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学术史解读..... 103
- 一、发起人安金槐..... 105
- 二、特邀报告人赵芝荃..... 121
- 三、“搅局者”邹衡..... 132
- 四、“裁判与舵手”夏鼐..... 148
- 伍 交锋——邹衡的夏商文化论争..... 153
- 一、引言：还是要向邹衡学习..... 155
- 二、“同室操戈”：邹衡与郑光(石加)的郑亳之争..... 157
- 三、西亳还是桐宫：偃师商城引发的争端..... 168
- 四、最后的声音：关于早期夏文化之争..... 192
- 五、回音：呼唤邹衡精神..... 202
- 陆 商从哪里来——先商文化探索历程..... 205
- 一、引言：从张光直与邹衡打赌说起..... 207
- 二、追寻殷商文化的源头：史语所同仁的集体行动..... 209
- 三、从辉县到二里头：商文化年代序列的确立..... 219
- 四、二里岗与二里头：早商文化与夏文化的纠结..... 225
- 五、“南关外期”与“南关外型”：一字之差的背后..... 235
- 六、先商文化探索的新高潮：豫东鲁西考古..... 247
- 七、先商文化探索的新征程：豫北冀南考古..... 262
- 柒 什么可以成为夏商分界的证据——夏商分界研究综述..... 271
- 一、缘起：韩维周的直觉与陈嘉祥的判断..... 273
- 二、纷争初起：二里头遗址与夏商分界..... 285

三、高潮：偃师商城与夏商分界.....	312
四、白热化：偃师商城小城与夏商分界.....	331
五、遭遇尴尬：郑州商城与夏商分界.....	365
六、症结：什么可以成为夏商分界的证据.....	384
捌 著史与分期——李济与邹衡的殷墟文化研究比较.....	391
一、李济的主旨：建筑“殷商新史”与“新中国上古史”.....	394
二、李济的途径：科学主义至上.....	409
三、从郑州到安阳：邹衡对殷商文化的初步分期.....	441
四、范式的确立：邹衡对殷墟文化的再分期.....	456
玖 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先周文化探索的早期阶段.....	469
一、徐旭生的陕西古迹调查.....	471
二、苏秉琦的斗鸡台发掘与瓦鬲研究.....	475
三、石璋如的关中考古调查与周都考察.....	483
四、“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的反思.....	492
拾 联裆鬲还是袋足鬲——先周文化探索的困境.....	501
一、丰镐考古的新时代与先周文化的初识.....	503
二、1979：先周文化探索的里程碑.....	508
三、1984：先周文化探索的大转折.....	519
四、邹衡的先周文化再研究.....	527
五、新生代的崛起	
——以刘军社、张天恩和雷兴山为例.....	538
后记.....	573

壹 个性、时势和境遇

——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

- 一、个性
- 二、时势
- 三、境遇
- 四、余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

顾颉刚先生是 20 世纪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由他发起的“古史辨”运动更是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一场革命，由“疑古”而引发的古史重建则成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① 顾先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而令人欣喜的是，总计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册的《顾颉刚全集》于 2010 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为我们全面完整地了解顾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生轨迹提供了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② 其中《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十二卷十三册、《顾颉刚日记》十一卷十二册和《顾颉刚书信集》五卷五册是《顾颉刚全集》的核心部分，通过这些新材料可以比较深入完整地了解顾颉刚是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的，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打开顾颉刚和其他“古史辨派”学者史学宝库的钥匙。^③

要了解顾颉刚走上“疑古”道路的前因后果，1926 年 4 月 20 日完

① 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中华书局，2003 年，第 1—2 页；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第 12 期，1995 年。

② 中华书局先是于 2010 年 12 月出版了套装六十二册的《顾颉刚全集》，次年则将全集分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顾颉刚读书笔记》、《顾颉刚书信集》、《顾颉刚日记》、《宝树园文存》、《清代著述考》和《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八集单独发行，本书所引均据后者。

③ 王汎森曾谓对“古史辨”运动的研究应至少包括三个层面，而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是：“思想家原来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些想法与他生活于其间的思想传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也就是主张对“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原因进行审视。参看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自序，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7 年。

稿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必读材料。^①因为在顾颉刚看来,这一篇自序是他“有生以来最长最畅的文”,他实际上是“借了这一册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目的是“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所以,我们正可以依据这“一部分的自传”来考察顾先生“研究古史的方法”以及他“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②

在自序中顾先生强调,“一事实是不会孤立的,要明了各方面的关系不得不牵涉到无数事实上去”。对于他自身的学术研究道路,他解释道,“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象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从顾颉刚自己所说的个性、时势和境遇三方面来分析他是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的。

一、个 性

顾颉刚在自序中反复强调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比如他说: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把我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我的内心的分毫。

^① 1926年6月朴社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末注明“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始草,四月二十日草毕”。查顾先生1926年4月20日当天日记,记有“修改增作自序十余页,毕”,但随后几天的日记中尚有标点自序若干页的记载,如21日“标点自序五十一页”,22日“标点自序四十九页”,一直到4月25日才记“标点自序三十八页,毕”;但随后又有新修改,如4月30日记,“修改自序十八页,即发印”,可见在4月20日初稿完成后又经过十天的修改才完成这篇长序。另据顾先生的日记,在自序的校样出来后,他又进行了多次修改,如5月7日“校《古史辨》自序前三页初校”,此后几乎每天都有看校样的记录,一直到6月5日“校《古史辨》自序清样毕,作勘误表”,而此时距离6月11日《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仅数日了。从顾先生对自序如此反复修改,直至付印的最后时刻,也可以看出他对这篇序言的重视程度。相关记载可参见《顾颉刚日记》卷一,第737—756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90页。按,本文从该自序频繁征引,为减少不必要的注释,尽量在行文中注明引文源自这篇自序,而本文中凡未加注释的直接引文也均出自该序。